

# 北大圖書館三本書之奇遇

• 徐 冰

也許由於母親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工作的關係，我這輩子總與書有交集。兒時她因為工作忙，經常是他們開會，就把我關在書庫裏。我很早就熟悉各種書的樣子，但這些書對我又陌生的，因為那時我還讀不懂。而到了我們能讀的時候，又沒甚麼書可讀，全國人民基本上只有一本「小紅書」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，我回到城裏，逮着書就讀，跟着別人啃西方理論譯著，弄得思想反倒不清楚了，倒覺得丟失了甚麼。就像是一個飢餓的人，一下子又吃得太多，反倒不舒服了。這也是為甚麼我的藝術總是與書糾結不清的原因。我、我們與書的關係是扭曲、錯位的。

中國傳統和成長環境讓我對書懷有敬意，下意識總是往文化代表物的「書」上湊，但只能湊到書的外部，離書的內部甚遠。好在書的閱讀功能正在被觸屏取代，書開始承擔起「文化情感寄託物」的功能，一部分人就開始變得對紙質書的裝幀、外觀這些書籍內容之外的、物質化的部分更看重起來了。這裏講講北大圖書館三本書的故事，都與書的內容無關。

## 一 「大字本」

世界上有一種書叫「大字本」，書名不怪、書卻很怪；大開本、豎排版、線裝書。字體是專門設計的，介於仿宋與黑體之間，這種字體既莊重又易讀，尺寸比二號標題字還大（行內稱「36磅字」），單字高1.5厘米。雖是線裝書，內容卻是「批林批孔」這類在那個特定年代才有的內容，當然也有四書五經之類的篇章。

我對這種「大字本」曾有耳聞，是專為毛澤東定制的書。毛一生酷愛讀書，手不釋卷，晚年由於眼疾，視力日衰，一般的書已經無法閱讀，加上身體虛弱，他更喜歡像古人那樣穿着睡衣，不分晝夜，臥牀閱讀。讀不了書，可要了老人家的命。中央決定每隔一段時間由毛開一個書單，再由上海、北京為主的定點印刷廠，在保密之下，全天候運轉，在最短時間內把書單上的書，用大號鉛字重新排印、裝訂成大字本，再用機要通道專程運抵北京，由姚文元送到毛的手裏。質量絕佳、速度驚人，我相信這種印刷史上發生的奇迹，緣於至高無上的政治任務。

大字本多則印二十份，少則幾份，同時也送給毛本人指定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閱讀。我家不是中央幹部，我手裏卻有幾本這奇書。事情是這樣的：

1994年西班牙巴塞隆拿的聖蒙尼卡藝術中心(Centre d'Art Santa Mònica)展出我的《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》，就是那個身上印了文字的豬在展廳交配的行為裝置。豬圈內需要三噸雜書，以書代土墊圈。通過母親聯繫，我來到北大圖書館，副館長張老師領我在大樓裏東拐西拐的，竟來到了圖書館的地下隧道，是當年的備戰防空洞。洞道寬約三米，深不見底，兩側堆滿了書，看起來像文革時期留下的。張老師劃了一段範圍說：「這一段書你都可以運走。」我問他這些書怎麼堆在這兒？他說：「都是些顧不上清理的廢書。」我問，是文革中抄來的嗎？他說：「怎麼來的都有。」

書被運到巴塞隆拿，在布展時我發現雜書中有幾本線裝書，太好了！我要的就是有各種書，應該把它們放在顯眼的地方。我過去拿起這幾本書，書名竟然是《簡明中國哲學史》和《孔丘教育思想批判》。這些內容怎麼在古書裏？難道這些就是傳說中的「大字本」？是！是！是！大字本！

這書拿在手裏好舒服，因為它極符合傳統製書原則。東方製書的目的源自弘揚佛法、普度眾生，元以後追求文人清雅品味。中國典籍浩瀚，即使是為御用特製，也要分類別冊，厚薄得宜，款式古雅，精緻端正，便於翻閱。

豎排、字大，便於臥榻的讀書人單手握書，讀幾行捲幾行，這種方便是橫版書所不可能達到的。大字本

用紙是產自福建西溝村的玉扣紙，此紙又稱「官邊」，是古代宮廷供紙，呈淡秋黃色，摸起來綿密如絲。這書不要說讀了，拿在手裏就舒服。據說毛讀的最後一本書，就是大字本《容齋隨筆》，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，他堅持讀了七分鐘，這是他去世的前一天。

東西方對書的理解不同，下面講一本西方書的故事。

## 二 一本《聖經》

西方製書工藝發展的動力也源於對宗教信仰的虔誠。古典製書要讓書籍顯得厚重、堅固、裝飾繁密，無處不顯示着永恆感。一部書，要傾注人類工藝與繪畫的全部技能；體現侍奉主的決心。一部經典被打磨得與凡世間其他事物都不同，似乎就是世界的全部。

到美國後，我對西方羊皮書產生興趣，冥冥中我意識到，這些書可以為我找到一條通道，進入西方文明內部的密室，幫我認識歐洲的核心品味，從而理解古典藝術到現當代藝術品味的來路。若我想在這裏開始我的事業，這是必須的功課。

我做過各種嘗試，其中有一件名為《後約全書》的創作。我把《聖經》新約全篇與一本當代通俗小說合成了一本書，方法是將兩本書中的詞交錯排在一起，從而每跳過一個字讀，就能讀出其中一本書的內容，而另一本書的文字卻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對讀者起着作用。兩本書的兩類詞彙以不尋常的關係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超思維的敘述。

做這本書，我追求盡可能貼近西方古典的製書方法；可是費了功夫，像是修了個羊皮書裝訂的學位。在西方做一本這樣的書，價格就是我半年的房租，我只能回到中國去想辦法。

我還是先去北大圖書館查閱資料。我向出納老師說：「我想借歐洲古代《聖經》，要最大開本的，裝訂最講究的。」過了挺長時間，從裏面用小車推出來兩本大書，像兩塊擦着城牆磚。這書別說讀了，一個人抬起來都費勁。這是我看到過的裝幀最繁瑣的書；壓花燙金，切口染畫，集各種製書工藝於一體；四角有雕花金屬包角，書上還有一個鎖扣，打開書需要一把鑰匙。我當時想：中國怎麼會有這本書？書太重，我只能先借一本。

回到家，移開桌上的雜物，我把書放在上面開始翻看。這時竟從書裏跑出來一張卡片，鉛排字印製、毛筆親寫：「XX先生敬啟。席設大陸春。石評梅敬約。哪年哪月哪日、幾點幾分。」看來是一張飯局貼子。石評梅？是那個「民國四大才女」的作家石評梅嗎？那陣子她家喻戶曉了，因為不久前關於她的電視連續劇《生死之戀》剛火了一把。石是1902年生人，二十六歲就去世了，算下年代能對上。我又查了石的筆迹，沒錯就是這個石評梅。

更巧的是，幫我校對《後約全書》的留學生朋友杜森，正在北大讀研究生，她論文做的就是石評梅。我與她討論這張卡片的意義：當時思想開放的年輕女性，印製請柬，說明設宴規模不會太小，並以個人身份邀請賓客，多少反映了當時文人的生活側面。石讀過這本大書嗎？最有可能的是此書屬XX先生的或他借來讀的，

隨手將石的請柬留在書中。XX先生是何許人我沒有查尋。

還書的時間到了，我最糾結的是，這張卡片應該與書一起還給圖書館？還是可以自己留着？最後，我把卡片給了杜森，這裏我不敢說「送給」，因為東西不是我的。留給杜森的理由是，在她手裏屬物有所用。其實，這事到現在仍然是我的一個心結，感覺做了不應該做的事。我後來像測驗似的問過一些人，結果是，在西方有部分人說應該還給圖書館，大部分國人都說沒必要還，是你發現的。我想這與信仰有關，就像這本裝飾繁瑣的大書內所藏的秘密。

有人說，北大圖書館的書裏，就會有一些名人簽字、批點、便條之類的遺留物。看來，這本大書百年來就沒人再翻過。也是，百年多災多難、兵荒馬亂的國度，誰有閒暇去碰這樣一本不方便讀的書呢？

下面就講一本扉頁有題字的書的故事。

### 三 一本植物學著作

這故事直接發生在我妹夫的母親、植物學家曹先生身上。曹伯母德高望重，人們尊稱她「先生」。她早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得生物學碩士學位，研究領域是「花粉管向化性的研究」和「蘭科植物傳粉後生理生化變化」，研究成果在國際生物學界引起關注，1951年回國參加祖國建設。曹先生的學術成就世俗搞不懂，就沒甚麼影響，而她一生最有影響的是「試管裏種黃瓜，脫離生產實際」，在文革中成為知識份子脫離生

產勞動實踐的典型被批判。曹先生為揭開「黃瓜單性花發育的目的，對決定植物性別的機制」的秘密，建立了「莖尖培養法」，創造性地在試管、三角瓶中做實驗。她面臨種種困難，不放棄這項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探究。最終，她的學生在其研究基礎上，在此領域做出了國際前沿性的推進。生活中的曹先生，最讓人羨慕的是她超常的記憶力：她沒有電話本，只要用過一次的數字就能記住。她「自嘲」：「沒辦法，它就在腦子裏了，想去也去不掉呀。」是沒辦法，屬於你的丟也丟不掉，不屬於你的費了老勁也得不到。但我們可以向她請教甚麼時間吃酸奶？是蘋果泥有營養，還是土豆泥有營養？因為她是生物學家。

書的故事是這樣的：1996年某天，曹先生的學生從北大圖書館借出了一本生物學方面的書，書名是《開花植物的有性繁殖》(*Sexual Reproduction in Flowering Plants*)。學生看到扉頁上有編者將此書送給老師曹先生的簽字：「致曹教授，我最好的祝願，來自克里斯琴·仲馬。1994年1月26日。」(To Prof. Tsao with my best wishes from Christian Dumas Yours. 26 Jan, 1994.) 書上蓋有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」書印和「贈閱」的圖章。

學生把書拿給老師看，曹先生大為不解。外國同行贈送的書，自己還未見到，怎麼就成了圖書館的呢？後經了解，海關書檢對有政治、色情嫌疑的書審查得非常嚴。由於此書題目有「性」(sexual)字樣，被海關扣留。不幸中的大幸是，書在被銷毀之際幸遇慧眼識珠之人，知道此讀物絕非色情書刊，書才免遭一炬，被作為參考書交北大圖書館。經學生與校方交涉

後，這本無辜的書才物歸原主，最終到了曹先生手裏。曹先生拿到書後擔心被法國同行認為不禮貌，忙不迭地準備寫信道歉，但性格爽朗的曹先生這時卻發愁了：「這事該怎麼說呢？」曹先生已作古，享年九十二歲。我知道為這事她給法國同行寫了信，但我無法想像她是如何解釋這本書之奇遇的。這情節如果被戲劇家編在劇情裏，人們會覺得不真實，太扯了。可我們就生活在這個不真實的真實裏，我們只能把日子當戲劇過。

#### 四 小結

一直想寫一篇我與書的奇遇，卻一直沒動筆。時間一拖長就愈發不想寫了。這次的新冠肺炎(COVID-19)疫情強迫人類進入了一個毫無準備的現場，加快了信息傳遞方式的改變，也加快了書退出歷史舞台的速度。民眾在享用「平等的」觸屏信息的偽裝下，一種無形的東西牽制着人們的辨識力，像病毒般侵害大腦，其後遺症的代價人類還來不及計算。由於數碼閱讀對紙媒的快速取代，紙質書開始承擔起維護書籍除閱讀功能之外的文化尊嚴的作用。這是我們作為對紙質書懷有情感的最後一代人的認識，才會把這些過時的事情寫一寫，因為以後就更沒人對此感興趣了——書都不重要了，關於書的故事就更不值得談了。

徐冰 當代藝術家，曾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，現居北京、紐約。